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高尔基研究文集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М. Горького

陈寿朋 邱运华 编选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研究

陈众议



高尔基研究文集

Научные статьи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М. Горького

陈寿朋 邱运华 编选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尔基研究文集 / 陈寿朋, 邱运华编选.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9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5034-9

I. ①高… II. ①陈… ②邱… III. ①高尔基, M.
(1868~1936)—人物研究 ②高尔基, M. (1868~1936)—
文学研究 IV. ①K835.125.6 ②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9425号

书 名 高尔基研究文集

编 选 者 陈寿朋 邱运华

责任编辑 田 智

特约编辑 张 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75

插 页 4

字 数 374 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034-9

定 价 5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

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世道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

“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

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裨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在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

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2010年1月

编者序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是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公认的俄苏无产阶级文学的创建人。他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想和文学组织活动对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高尔基出生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是一个手艺人的孩子。他少年丧父,被母亲交由外祖母抚养。外祖父是一个染房的老板,家境本还富裕,但是,一场大火使全家沦为赤贫。从此,他流落人间,为生存开始干各种工作。1892年,他来到萨玛拉,在这里遇见了律师拉宁。后者鼓励他从事文学写作。1893年,他以“高尔基”的名字第一次发表作品,这就是《马卡尔·楚德拉》。《马卡尔·楚德拉》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与19世纪末期俄罗斯文学的整体面貌完全不一样,它的浪漫格调、外省环境、新颖的人物和他们的价值标准以及语言风格,给这家外地报刊带来了全新的气息。随后,“高尔基”这个名字频繁地出现在俄罗斯外地的报纸、杂志上,引起了全俄罗斯读者的注意,也引起了俄罗斯文学界的注意。1895年,高尔基在尼·米哈伊洛夫斯基主持的《俄罗斯财富》上发表了著名小说《切尔卡什》。这篇小说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篇小说,高尔基前面几年写作的作品被为人广泛注意,高尔基也才成为全俄罗斯文学谈论的热门话题。

1898年是“高尔基年”。这一年,两个年轻的出版商投资出版了高尔基的第一种文集《特写与短篇小说集》;同年,高尔基出版了中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波谢在《启蒙》上发表题为《忧郁的抗议者的歌手》专论,斯卡比切夫斯基在《祖国之子》第116、123、219期批评栏上发表短评《高尔基:特写和短篇小说集(两卷集)》,明斯基发表《关于苦闷和渴望自由的哲学》论文,特别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俄罗斯财富》的第9、10月号上连载了长篇论文《论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他的

主人公》。批评家们相继发表专门的评论文章,阐述高尔基小说的基本内涵、思想艺术价值。这些事件几乎发生在同时,共同营造了“高尔基年”的浓郁气氛。

从1898年开始,到1936年高尔基去世,文学界对高尔基的文学创作、理论主张、生活中的重要事件,都予以格外关注;文学批评家每年都发表大量文章阐述对高尔基创作的新看法、新观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0世纪之交活跃在俄罗斯政坛的各种党派纷纷发表对高尔基文学创作的看法,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阐述他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列宁、普列汉诺夫、沃洛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社会民主党人的论述,有宗教文化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菲洛索福夫的批评文章,还有众多民主派的文学批评家的文章,以及各类作家的文章。除了研究高尔基生活、思想、创作的常规文章外,研究文献基本集中在高尔基几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出版上,例如中篇小说《母亲》、戏剧《在底层》和《敌人》、长篇小说《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政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等。

本论文集本着这样的编选原则:

一、强调入选文献的初始性和原创性。1898年发表的研究文献全部收入,是这个原则的体现。在编选者看来,1898年发表的几篇文献基本上涉及到高尔基早期创作的思想、艺术特征,对作家和革新者高尔基的定位,基本上在这些文献里确定下来。以后,对于高尔基早期创作的研究文献还有很多,但是,基本上没有提出超越这些文献的范围。

二、高尔基研究成就最高的时期是1910年代,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献基本确定了高尔基学的格局。包括列宁在内的很多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都纷纷发表研究著述,系统阐述高尔基、解释高尔基,立场不同,层次各异,但是水平和质量均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本文集将普列汉诺夫、沃洛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菲洛索福夫等人的研究文献编选进来,这些文献是这个时期研究成果的代表。

三、编选者认为,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学界对高尔基的研究,一般来说,水准有限,重视程度也有限,所以,文选没有收入他们的著述。

四、编选者认为,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语学者对高尔基的研究成果有其特殊性,这影响到它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历史地看,汉语学界高尔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以前为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高尔基

研究基本上处于介绍苏联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推广高尔基无产阶级文学思想服务于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现实进程,因此,就不能简单地以学术性来判断其价值。第二个时期是1949—1979年间。这个时期的高尔基研究从本质上仍然属于“介绍—服务”性质,只是介绍的规模更大更广,也更深入;服务的对象则改变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建设。虽然有1966—1976年之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高尔基的作品也处在被简单化解释的对象之内,但是毕竟高尔基是唯一可以谈论的外国重要作家,他在中国文革十年中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因此,我认为,对于高尔基研究来说,1949年之前和1949—1979年之间的性质都可以归纳为“介绍—服务型”。应该说,真正的学术研究型还没有开始。1979—2010年为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高尔基学仍然保持着明显的介绍印迹,但是,其创见已经出现。即使在介绍方面,也明显侧重在学术研究的领域,现实的和政治的功利性明显减少;而在开创性方面却日渐增加,张羽和李辉凡关于高尔基早期创作的研究、陈寿朋关于高尔基美学思想的研究、韦建国关于高尔基思想矛盾和错误的研究,特别是汪介之对高尔基研究范式的突破性研究,一改传统的无产阶级文学成长的研究路径,把高尔基与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的探索、反思和困惑的路径联系起来,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汪介之的研究成果应该视为中国学界高尔基研究的标志性和代表性成果。

编选者把高尔基研究文献的编选重心放在1920年之前,对此后的研究文献基本上不涉及,仅仅收录了卢那察尔斯基、卡斯特尔斯基和谭得伶的研究文献,这固然与文选的篇幅要求相关,但也是编选者对高尔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重点、重心的认识相关。编选者认为,无论是中国、西方还是苏联时期,在高尔基研究这个领域,意识形态的角逐是非常明显的,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一味歌颂、肯定,或一味抹黑、歧解,或为我所用、随意肢解,都无法产生严格意义上的高尔基研究学术成果。因此,在本论文选里就只能有所舍弃了。

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是产生在意识形态的需要中,也不可能产生在象牙塔里,而只能产生在自由的思想交锋中。

2010年9月4日

编选者序 1

第一辑 早期创作的批评

忧郁的抗议者的歌手 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波谢

追寻生活的真谛 18

弗拉基米尔·费奥菲罗维奇·鲍恰洛夫斯基

高尔基的散文和短篇小说 33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斯卡比切夫斯基

高尔基作品中的新特点 48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斯卡比切夫斯基

关于苦恼和渴望自由的哲学 54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明斯基

关于流浪者的生活方式的哲学(里什潘和高尔基) 64

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伊格纳托夫

论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他的主人公 73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

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他的新主人公形象(短评) 123

列昂尼德·叶戈洛维奇·奥博连斯基

第二辑 20 世纪初期的文学批评

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在底层》(短评) 137

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阿德里安诺夫

论马·高尔基 149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

高尔基的终结	167
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菲洛索福夫	
谈谈工人运动的心理	188
(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敌人》)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论俄罗斯的所谓宗教探寻	209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222
瓦西里·利沃维奇·李沃夫-罗恰切夫斯基	
马克西姆·高尔基	259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	
非神圣的罗斯(高尔基的信仰)	277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	

第三辑 综合批评

艺术家高尔基	293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萨姆金	312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真正人民的书	348
(——高尔基的《母亲》)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卡斯托尔斯基	
俄罗斯和中国的高尔基学简论	364
谭得伶	

后记	397
----------	-----

第一辑

早期创作的批评

